

赵树理 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
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

朱凌 /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赵树理阐释史

——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之关系

朱 凌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阐释史:赵树理创作价值变迁与时代文化思潮
之关系/朱凌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607-5404-8

I. ①赵… II. ①朱… III. ①赵树理(1906~1970)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519 号

责任策划:武迎新

责任编辑:武迎新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4 印张 257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关于“赵树理阐释史”的阶段划分	(1)
二、关于赵树理研究的几个重要范畴	(18)
三、本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20)
第一章 “五四”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对“五四”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	(25)
第一节 不同语境对赵树理价值的择取	(26)
一、解放区语境对赵树理“阶级”价值的选择	(27)
二、赵树理“启蒙”价值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变迁	(30)
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启蒙”退隐下的多元化历史语境对赵树理的选择	(33)
第二节 赵树理的选择	(37)
一、启蒙：“姿态”与“精神”	(37)
二、“自我身份”的选择与重构	(41)
三、语境：“契合”与“冲突”	(45)
第三节 新的“现代性”	(51)
一、赵树理对“五四”现代性的拓展	(51)
二、赵树理创作“现代性”的复杂性	(54)
小 结	(58)
第二章 多重话语中的大众化选择	(59)
第一节 关于“赵树理方向”的“问题”	(60)
一、关于“赵树理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解读	(60)

二、关于“赵树理方向”与“工农兵方向”的辨析·····	(63)
三、被规约的“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审美期待·····	(67)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多义化解读·····	(70)
一、社会主义文化情境中的“现实主义”·····	(70)
二、被分裂的“现实主义”·····	(74)
三、赵树理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	(77)
第三节 “大众化”视阈与赵树理研究的浮沉·····	(81)
一、政治规约下的“大众化”方向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81)
二、接受视野下的“大众化”与赵树理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86)
小 结·····	(88)
第三章 民间智慧与自由精神·····	(90)
第一节 时代的“民间”·····	(91)
一、赵树理的“民间”构成·····	(91)
二、“被规约的民间”与“纯民间”·····	(94)
第二节 赵树理的“民间”选择·····	(101)
一、赵树理对“民间形式”的自由选择·····	(101)
二、赵树理对“民间”自由精神的吸纳·····	(103)
三、选择“民间”的意义·····	(107)
第三节 赵树理“民间”的“现代性”问题·····	(111)
一、赵树理“民间”品格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111)
二、赵树理“民间”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115)
小 结·····	(118)
第四章 “传统”与“现代”的互融·····	(120)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与俗文化·····	(121)
一、雅文化的精神与俗文化的形式·····	(121)
二、“雅俗共赏”与赵树理的“传统”观·····	(124)
第二节 “五四”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128)
一、“五四”启蒙的现代精神与传统儒学师教·····	(128)
二、赵树理现代“启蒙”意识与传统师教“育人”观念的兼容性·····	(130)
第三节 赵树理的“女性”观·····	(133)
一、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妇女”·····	(133)

二、解放区语境下的妇女观与赵树理女性观的矛盾与契合	(138)
第四节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中定位赵树理及赵树理研究的“现代性”价值	(143)
一、赵树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阈扩大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范畴 ...	(143)
二、传统与现代的互融视角推动了赵树理研究的现代价值视阈的 扩充	(146)
三、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对赵树理身份复杂性的确认	(148)
小 结	(152)
第五章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154)
第一节 主体的拒绝与客体的归入	(155)
一、作为“流散星团”的“山药蛋派”	(155)
二、各种文学评价对赵树理归入性选择的演绎	(156)
第二节 地域归属、时代感认同与文化身份交错的复杂性而引 起的流派认同与质疑	(157)
一、归属、创作风格等认同引起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不可拒绝的 相关性	(157)
二、文化归属的复杂性、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引发的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质疑	(161)
第三节 赵树理对“山药蛋派”的价值和意义	(164)
一、时代语境中的起伏的现代意义	(165)
二、对“五四”现代文化传统承继的独特价值	(167)
三、传统走向现代的“民间”的现代价值	(168)
小 结	(170)
结 语	(171)
一、文学史的建构与重构对赵树理“现代性”的书写	(172)
二、接受视野中的赵树理的“现代性”的界定	(176)
三、全球语境下的赵树理阐释：“赵树理方向”的新视野	(178)
四、文学的“现代性”视阈的扩张：新的理论框架中赵树理阐释多元化 整合的现代性	(181)
附录 赵树理阐释文献资料汇编	(184)

绪 论

一、关于“赵树理阐释史”的阶段划分

(一)赵树理崛起的历史机缘

20世纪3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力量对“五四”文学传统的不断修正,“文艺大众化”逐渐成为文艺争论的焦点。多数左翼作家站在“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把“大众化”理解为“化大众”,因此文坛缺少真正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众所喜欢和接受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作为文学话语转型的变革时代,知识分子言说向农民言说转变的可能性日渐强化,这为赵树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赵树理从一开始就有意坚持的“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不只是一种策略的选择,而是具有艺术本体意味的重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这一选择应视为“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延续,也是“人的文学”的一种具体化。与“五四”精英化写作不同,赵树理的创作观念顺应了特定时代文学变革的大趋势,但同时这一“顺应”一开始便遭遇到困难。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赵树理的大众化文艺主张并不为当时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赞同,反遇到不少冷嘲热讽。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一状况得以扭转。随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的发表,赵树理在解放区迅速赢得赞誉——但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文学道路已能够很快获得解放区文艺界的广泛认可。1943年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指出,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新社会的某些乡村,或某些角落”,提出了“立场问题、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接近群众的要求”,这成为此后评价赵树理小说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小说在艺术创造上的一些特征,但仅仅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这说明作者偏向于“思想教育”,并不十分关注艺术形式。该文还特别指出赵树理的“眼界还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特别是由于学习不够,马列主义观点

的生疏,因此表现在作品中的观点还不够敏锐、锋利、深刻,这就不能不削弱它的政治价值”。^① 历史地看,这样的批评甚至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对赵树理的阐释。1946年前后,解放区文艺界在全面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开展思想大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开始把赵树理的创作确立为“方向”。此后,“赵树理方向”日益发挥出规整文学“现代性”方向的作用,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赵树理经过近十年的沉寂,最终成为解放区文艺界的旗手和方向。赵树理漂亮转身的关键,正是由于他的“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的创作原则,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讲话》中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当时的解放区文艺界,正如艾思奇于4月25日执笔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中论述的那样:“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趋于一致……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新的文学经典的确立变得十分必要。于是,与《讲话》的大众化姿态相契合的赵树理,被纳入了《讲话》的框架中并迅速被奉为经典。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左翼文艺界出现了大量高度赞扬赵树理的“大众化姿态”及取得的“杰出成就”的评介文章。周扬以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代言人的身份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陈荒煤在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概括出赵树理创作的三个特点——“政治性很强”、“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义”,并明确提出“赵树理方向”这一口号,“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这些观点得到了当时解放区文艺界的肯定和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论述有着明显的解放区语境影响和《讲话》的美学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述只看到了赵树理大众化的创作观念与《讲话》精神相契合的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赵树理作为审美个体的复杂性。赵树理“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与《讲话》中所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是有着极大差异的。毛泽东在《讲话》中界定的“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赵树理站在农民立场上为农民写作的姿态与《讲话》对“大众化”的界定不谋而合。但毛泽东《讲话》的实际意图却是“整风”,是以“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感”来取代当时延安出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这里面包含着鲜明的阶级性的政治意图。其实事实也是如此,在以后的解放区文艺实践中,“工农兵大众”很快就演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曾对毛泽东关于“大众化”的论断阐释道:初期革命文艺工作者所理解的“大众化”就是将“无产阶级意识”用大众容易接受的

①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乙种)》,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形式灌输给大众,为的是改造大众的意识。^① 这里的大众也包括知识分子自身。《讲话》中提出的“面向工农兵”实际上也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艺术策略。解放区文艺界在《讲话》的框架下,对文学重新定位并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试图构建新的文学规范。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高度赞扬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然而赵树理强调的大众化是以农民为具体对象的大众化,而周扬却以农民与地主二元对立的视角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三篇小说阐释为描写阶级斗争之作,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界定,从而证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② 由此看出,解放区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其主旨是要鼓动大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完成政治任务,它的核心立场是政治立场。赵树理的大众化并非站在政治立场上为政治服务,这与《讲话》中“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是有区别的。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是源于自身对乡野文化亲和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对《讲话》规约的政治语境强势力量的屈从。因此,他的大众化的思想并非源于《讲话》,而是源于自身对于乡土文化未来发展前景的期待。

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艺界,赵树理作为“新的美学经典”的诞生过程充满波折。《讲话》之后的几年,赵树理虽然在群众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但他还未作为“经典”被推崇,也没有被解放区文艺界广泛认可。40年代中期,由于对《讲话》框架中“为农民写作”的经典范本的急需,赵树理有别于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创作姿态契合了《讲话》框架中提倡“大众化”的话语形式,迅速被尊为“经典”,并确立为“方向”。此时,对赵树理赞誉的强势话语压倒其他一切不和谐的声音,解放区文艺界对其评价表现为充满热情的高度赞扬。

(二)文学激进思潮中赵树理被价值化过程的复杂性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大众化创作原则与《讲话》对“大众化”的规约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融合和矛盾,文艺界对赵树理的评价也出现了犹疑:一方面,赵树理的作品作为“经典范本”被继续推崇;另一方面,其“缺点”也在不断被发现。这个时期,关于赵树理的论争纷繁不断,最终走向了“文革”的大批判。

随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被确认为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此时,一切文学流派、文学思想、文学力量被整合进由左翼革命文学所衍生的新的文学语境中。在这一“文学体制化”运动中,“五四”文学传统开始了被持续弱化的过程,“五四”文学精神特别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逐渐被抛弃。这个时期,“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

① 参见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载1944年4月8日《解放日报》。

② 参见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

的左翼文学成为中国文艺的绝对主导力量。在当代文学规范的确立上,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与政治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次文代会明确规定文学艺术家要“将政治作为他观察和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于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文学创作不可替代的准则。这个时期,赵树理作为旗帜,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赵树理研究得以更大范围地展开。吴调公的《人民作家赵树理》^①、刘真的《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②、万曼的《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③、张瑞华的《赵树理在太行山》^④、史纪言的《回忆赵树理同志》^⑤和《赵树理同志的青年时期》^⑥等,通过对赵树理生活琐事、成长过程和创作经历等方面的描述,初步再现了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大众化创作风格。这些文献多关注的是赵树理与农村生活的密切关系,强调了赵树理融入农村的“农民作家”的特质。苗培时的《〈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有意将赵树理的作品作为“经典范本”,突出其对《讲话》的印证功能。^⑦ 思基的《谈赵树理的短篇小说》赞扬赵树理的小说是“群众生活与斗争现实的反映”,具有直接的“指导现实的意义”。^⑧ 巴人的《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也是将赵树理作为现实主义“道路和方向”进行高度赞扬的。^⑨

另一方面,赵树理与时代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缺陷”也不断被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这正是当时激进文学观念对已有“现实主义”创作体系的修正。在赵树理得到肯定的同时,其创作“典型化”程度不够等的问题被着重提出。俞林在《〈三里湾〉读后》中指出,作品对于农村“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⑩ 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甚至严厉指出了这部作品的“很多缺点”。文章指出,赵树理忽略了矛盾的正面和主要的一面,没有将群众刻画成英雄。特别是对软英这一形象的塑造,她只是消极地等待解救,没有奋起抗争。^⑪ 关于《邪不压正》的论争,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赵树理研究趋于复杂的一

① 吴调公:《人民作家赵树理》,上海三联出版社1954年版。

② 刘真:《我的老师严文井、赵树理》,载1956年3月10日《光明日报》。

③ 万曼:《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现代文学选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④ 张瑞华:《赵树理在太行山》,载1958年1月5日《光明日报》。

⑤ 史纪言:《回忆赵树理同志》,载《汾水》1978年11月号。

⑥ 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的青年时期》,载《战地》1979年第5期。

⑦ 参见苗培时《〈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载1957年5月23日《北京日报》。

⑧ 参见思基《谈赵树理的短篇小说》,载《文学青年》1958年第2期。

⑨ 参见巴人《略谈赵树理同志的创作》,载《文艺报月刊》1958年第11期。

⑩ 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

⑪ 参见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载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个表征。竹可羽在《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中指出,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①。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则是在作品合理地反映现实这一点上为其进行辩护。^②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指出:《三里湾》对于农民的革命性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对于阶级之间的矛盾描述过于简单,且以为易于解决。^③这说明赵树理始终无法摆脱他对自己固有文学理念的坚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但仍不能完全融入《讲话》所确立的美学理念体系之中。实际上,赵树理虽然按照当时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真实记录农村的生活景象,但是赵树理遵循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当代文学规范框架下受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现实主义。被规约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方面强调表现“现实斗争”,要求作家反映中国社会面貌的“深刻的变化”的斗争,即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另一方面,作家必须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在立场、观点、情感上与农民保持高度的一致。赵树理在反映中国社会面貌的“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凸显了他所经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的问题”(新的伦理关系的调整)。他在乡土资源里寻找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元素。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文学激进思潮的泛滥,对赵树理评价的犹疑和矛盾进一步突出。这些评论都是被规约的文学语境下文学发展的政策化以及被无限扩大的政治功能和意义在文学领域中的体现。虽然《文艺报》刊发了一系列否定性的文章,但是编辑部还是支持赵树理的。唐弢的《人物描写上的焦点——读了赵树理同志〈锻炼锻炼〉》^④、文秀的《武养同志的批评脱离了作品的具体内容——关于〈锻炼锻炼〉》^⑤、安杨的《这是什么工作方法?——关于〈锻炼锻炼〉》^⑥、王道伦的《歪曲了现实吗?——讨论〈锻炼锻炼〉》^⑦、正祥的《反对框框——关于〈锻炼锻炼〉》^⑧、毕基初的《这样写不能叫歪曲现实——读〈锻炼锻炼〉》

① 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载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参见耿西《漫谈〈邪不压正〉》,载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③ 参见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④ 唐弢:《人物描写上的焦点——读了赵树理同志〈锻炼锻炼〉》,载《人民文学》1959年8月号。

⑤ 文秀:《武养同志的批评脱离了作品的具体内容——关于〈锻炼锻炼〉》,载《文艺报》1959年第9期。

⑥ 安杨:《这是什么工作方法?——关于〈锻炼锻炼〉》,载《文艺报》1959年第9期。

⑦ 王道伦:《歪曲了现实吗?——讨论〈锻炼锻炼〉》,载《文艺报》1959年第9期。

⑧ 正祥:《反对框框——关于〈锻炼锻炼〉》,载《文艺报》1959年第9期。

炼》》^①、李秉直的《从“中间人物”到“问题小说”》^②等都是支持《锻炼锻炼》的评论文章。王西彦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赞扬成为这些肯定性文章的结论性意见。^③但是,这些肯定的声音已不再作为文坛或评论界的主流语态出现。由于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农村的政策提出一些质疑,他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因此,“赵树理方向”不再被提及,对赵树理的研究也陷入低潮。

20世纪60年代初,在反思“大跃进”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背景下,文学界也有“现实主义深化”概念的提出,茅盾、邵荃麟等也都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赵树理又被重新推为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而“现实主义的深化”、“干预生活”又成为赵树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佐证。1964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中体现了对赵树理评价的重大转变。作为这一时期论争的尾声,剧本《十里店》引起的论争,正是印证了这篇文章对赵树理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过程中,赵树理的创作理念与当代文学规范呈现出越来越疏离的状态。对赵树理评价由贯彻《讲话》精神的“方向”、“旗手”逐渐走向了发现其与《讲话》“方向”相悖的“缺点”的挖掘。虽然也有一部分声音时常跳出来肯定赵树理“大众化”的价值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他们最终与赵树理一同被淹没在一片政治批判的鼓噪中。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赵树理研究的恢复与开拓

在这一时期,孙犁的《谈赵树理》^④一文,深刻地揭示了赵树理创作成功的时代原因。史纪言的《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⑤简要介绍了赵树理一生的经历和著作。另有赵广建的《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⑥、马烽的《忆赵树理同志》^⑦等。申双

① 毕基初:《这样写不能叫歪曲现实——读〈锻炼锻炼〉》,载《北京文艺》1959年10月号。

② 李秉直:《从“中间人物”到“问题小说”》,载《火花》1964年第4期。

③ 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艺报》1959年第10期。

④ 孙犁:《谈赵树理》,载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⑤ 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载《汾水》1980年第1期。

⑥ 赵广建:《回忆我的父亲赵树理》,载1978年10月22日《山西日报》。

⑦ 马烽:《忆赵树理同志》,高捷编《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鱼的《铁笔圣手——赵树理》^①、韩玉峰与赵广建合写的《赵树理的创作与生活》^②、黄修己的《赵树理评传》^③对各个时期赵树理创作的影响、社会作用以及人们对他的评价和争论展开较系统的研究,这些弥补了过去赵树理研究的不足。1980年韩玉峰等的《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④、1981年王中青的《评论与回忆》^⑤、1984年董大中的《赵树理写作生涯》^⑥、1985年高捷的《回忆赵树理》^⑦等,也都对赵树理的生平及创作有详细的叙述和评价。另外,也有学者从理论的高度对赵树理的创作重新评价,如康濯的《根深土厚——忆赵树理同志》^⑧、周扬的《〈赵树理文集〉序》^⑨等,赵树理在严酷的环境中对“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备受推崇。这个时期赵树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很多学者对赵树理研究资料进行全面补充、翻新。1981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⑩,对赵树理80年代之前的研究资料作了一个汇总,并在附录中详细列出了主要的研究资料(著作和论文)的目录。同类资料还有1985年黄修己编选的《赵树理研究资料》^⑪。另外,董大中编订的《赵树理年谱》^⑫等在对赵树理事迹考证方面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四”文化传统与现实主义的回归是这个时期时代语境中重要的文化思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赵树理与“五四”文化传统关系得到凸显,“十七年”以来将政治话语作为评价赵树理的唯一价值标准的单一偏颇的思路开始得到纠正。新时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高扬起“五四”的旗帜,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弘扬“五四”文学精神,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显示出其不平凡的意义。新时期“启蒙”语境中赵树理创作的启蒙精神得到强调,此时涌现出一批探讨赵树理对“五四”启蒙精神承继的研究成果,如李文儒的《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之关系》^⑬、杨志杰等的

① 申双鱼:《铁笔圣手——赵树理》,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韩玉峰、赵广建:《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韩玉峰等:《赵树理的生平与创作》,载《汾水》1980年第9期。

⑤ 王中青:《评论与回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 董大中:《赵树理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⑦ 高捷:《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⑧ 康濯:《根深土厚——忆赵树理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⑨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载1980年9月22日《工人日报》。

⑩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⑪ 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乙种)》,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⑫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⑬ 李文儒:《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之关系》,载《文论月刊》1991年第9期。

《论赵树理创作中的反封建主题》^①等。随着赵树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者对“启蒙”意义的解读开始分化。在论述赵树理与“五四”关系的同时,一部分评论者进一步探求赵树理在民间、大众化、民族化方面的成就。

在以“启蒙”为主流话语的80年代文化语境中,研究界对“十七年”赵树理研究进行了全面反思与深化,不仅反思极“左”路线造成的研究中的偏差,也拓展了研究的思路,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人们肯定赵树理的固有价值(“十七年”已有的价值评价),并对赵树理作品原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1978年,李文儒在《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中,对赵树理创作的语言特色和民族风格进行了论述,重新肯定了赵树理的创作价值。^②1981年,李国涛在《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一文中,将研究目光伸展到赵树理的早期小说《盘龙峪》,拓宽了研究的范围。^③人们对赵树理创作及其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有的研究者把这种思考与对《讲话》的思考联系了起来。通过赵树理的成败公正地透析一个特定时期文学的历史,从这点来看,常文显然是有启发性的。但这篇文章只是谈到《讲话》对赵树理的影响,而忽视了赵树理对《讲话》呼应的历史现实。这是以往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总是突出《讲话》对于赵树理的影响,而忽视赵树理自身对于文学理念选择的自主性。赵树理的创作思想源自本身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他对《讲话》的呼应是出于自身文学理念选择的巧合,并非刻意的迎合,也不是《讲话》指导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们寻找新的视角对赵树理进行更为开放的研究,并重新界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在这阶段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赵树理创作风格上的独特性,还探悉到“五四”文化传统、大众化民族形式等中国现代文学演进过程中这些重要问题与赵树理的关系。研究者通过对赵树理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拓宽了赵树理研究的视野。在一系列比较研究中,较有成绩的是对赵树理与鲁迅关系的论述。董大中的论文特点在于论述赵树理对鲁迅的继承。后来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他们的承继关系时,也开始注意两者的“相异性”。

80年代中后期,“文化寻根”思潮给赵树理研究带来了纵深性的发展,赵树理研究出现了更为广阔的视阈。人们跳出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范畴,将赵树理放在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下进行观照,陆续开始运用现代农民革命、农民文

① 杨志杰、彭韵倩:《论赵树理创作中的反封建主题》,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② 参见李文儒《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载《山西师范》1978年第2期。

③ 参见李国涛《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载《汾水》1981年第5期。

化的变迁等视角开展了对赵树理的新的观照。

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恢复和发展,赵树理研究又进入一个繁荣的时期。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研究者在充分肯定赵树理“十七年”已有价值的同时,也在不断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从而发掘赵树理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时期,赵树理研究包括对赵树理与《讲话》关系的重新阐释,改变了将赵树理归入《讲话》视阈的研究方法,从正反两方面指出《讲话》对其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仍没有从赵树理的选择与《讲话》的契合与矛盾来发掘赵树理创作观念的复杂性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另外,随着研究界对“五四”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这个时期涌现出一系列论述赵树理与“五四”关系的文章。它们以“五四”为赵树理的创作源头,将赵树理与鲁迅、老舍等作家进行比较,试图摆脱左翼文学规范对赵树理评价的束缚。这些论述从文学“现代性”角度评价赵树理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并挖掘他对自身复杂文化身份的选择。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未指出赵树理与“五四”关系的复杂性,没有将其与“大众化”、“民间”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放在同一视阈下进行观照,因此并未充分发现赵树理对“五四”文化传统承继与悖逆的复杂矛盾。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赵树理研究,在方法选择上从单一走向多样,突破了社会历史学单一的研究格局,充分借鉴国外许多现代研究方法。在多角度系统化的观照下,赵树理文学存在的复杂性逐步被呈现出来。

(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赵树理研究的困境与突围

20世纪80年代末,在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五四”文学正统观实际上已经确立起来。因此,在对赵树理文学范畴归属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两难的局面。赵树理究竟是延续了“五四”文学传统,还是维系解放区树立起来的左翼文学传统,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将赵树理归入左翼文学传统的论断直接导致了对赵树理创作的过低的评价。另外,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文学领域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对文学承担过多的责任提出了质疑(如对“干预生活”口号的质疑),并对文学长期以来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而忽视文学“本体”的状态进行反省。这种关注文学“本体”的倾向对赵树理评价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导致赵树理研究的又一次低迷。一方面,学术界仍然肯定赵树理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赵树理的作品由于落入左翼文学强势话语范畴而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因此,他的作品存在着艺术和理性方面的种种缺憾,甚至有人将赵树理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加以否定。关于“赵树理方向”的论争充分体现了这个时期关于赵树理评价的趋向。1988年《上海文学》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重评”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有代

表性的三个作家,从而引发了关于“赵树理方向”的新一轮讨论。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从赵树理创作思想、审美理想的来源方面,否定了赵树理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赵树理方向”发展的时代进步性。这篇文章将赵树理归入左翼文学的范畴,将赵树理的创作及“赵树理方向”作为政治权威话语之下的产物,完全忽视了赵树理作为创作主体的独特性。^①唐再兴以《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评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为题,对戴光中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戴光中将“赵树理方向”归结为在内容上提倡“问题小说”和在艺术上主张“民间文学正统论”是不准确的,并通过将《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与戴光中的《赵树理传》进行比较,认为戴文没有“一个经得起的标准”,矛盾百出,赵树理不仅领导不了主流,也不是所谓“逆流”。^②这些文章或从可叙性文本的话语方式去探寻赵树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表现出的明显缺憾的根源,或对“赵树理方向”进行历史的反思,或把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赵树理方向”置于传统与现代化交汇的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整体审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评论界对赵树理的评价又逐渐回归于公允、客观、稳定的状态。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逐步成熟,赵树理研究得以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这个时期出现了新时期以来较为完整的一部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即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树理研究文集》。文集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收录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主要的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卷主要收录了对赵树理生平创作及作品出版进行细致考察的资料;下卷收录了国外学者对赵树理的研究资料。这个时期,研究界对“五四”文学传统及对左翼文学传统都能够有重新的认识和公允的评价。赵树理不再作为被褒贬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放在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框架中探索其结构性意义和价值。在这种时代语境中,赵树理研究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便呈现出来,这是赵树理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期。由于赵树理研究受到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它由原来的社会政治层面进入到广阔的文化层面。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1995年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中将赵树理放在地域文化的视阈中进行研究。^③张树武、王确的《儒家传统与赵树理的民众观》多方面地论述了儒家文化与赵树理的艺术信仰的复杂而深刻的联系。^④

张颐武在1990年第三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赵树理与

① 参见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载《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② 参见唐再兴《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评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载《文学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2期。

③ 参见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参见张树武、王确《儒家传统与赵树理的民众观》,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写作”——读解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文章通过对赵树理最后三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方式的分析,指出赵树理对写作及其功能的失望是其晚年从小说创作转向戏曲的深层原因。汪东发的《〈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叙事个性》,从叙事学的角度来比较三部作品的异同,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视野。该文认为,《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分别表现为“实化”、“史化”、“诗化”的个性倾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三种基本范式。^① 多重视阈下赵树理复杂的女性观的研究体现了赵树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化观念。王玉屏的《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解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从女权主义角度对“三仙姑”形象进行解读。^②

另外,比起 80 年代的赵树理比较研究,本时期进一步拓展了赵树理比较研究的空间,比较视阈更为广阔,表现在共时层面、历时层面以及共时、历时相结合层面,极大地拓展了赵树理研究的思路。李辉的《赵树理、浩然之比较》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五六十年代大陆乡土小说发展轨迹:“赵树理方向”→“创业史”风格→“艳阳天”模式。^③ 吕汉东的《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认为:“赵树理的‘山药蛋味’和汪曾祺的‘高邮味’都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赵作品的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为主导,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从而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审美特色。汪作品的底蕴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为主,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从而融合为以‘雅’为主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文章在对赵、汪的“中国味”对比过程中指出两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在比较过程中突出了传统文化对赵树理创作的深远影响。^④

综上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赵树理研究中出现许多偏颇过激之辞,甚至大力贬低,这都不利于批评的正常展开。经历了 80 年代赵树理评价的低潮,90 年代赵树理研究终于冲出重围,进入了视阈开阔、视点多样和视角新颖的繁荣创新时期,但不应有的缺憾依然存在。首先,对赵树理创作的丰富性以及文学影响力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其次,赵树理研究呼唤填补空白,例如,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标示赵树理研究的学术定位等。

(五)新世纪以来,赵树理研究的新景观

进入 21 世纪,随着文学语境日益多元化,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日益多元

① 参见汪东发《〈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叙事个性》,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

② 参见王玉屏《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解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载《燕山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李辉《赵树理、浩然之比较》,载《文学自由谈》1996 年第 4 期。

④ 参见吕汉东《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载《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